

文明互鉴：一个新的文明观

□ 张西平

一

1969年，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十三集纪录片《文明》向观众展示了人类文明，但展示的只是灿烂辉煌的西方文明，如卢瓦尔河城堡、佛罗伦萨的宫殿、西斯廷教堂、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街。编导的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基督教文明之前的时代和东方都是不开化的。这显然是对人类历史的片面解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在其著名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构建了一种文明形态史论，以文明为历史研究的单元，对世界多样文明同等地进行研究，探究世界文明演化的法则与规律。他认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演化是多元的。他认为在6000年人类历史上，世界上有过许多种文明，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可分为拜占庭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伊朗文明可合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文明和日本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古代墨西哥文明、育加丹文明、玛雅文明，以及一些停滞的文明，即波利尼西亚文明、因纽特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奥斯曼文明。

不论汤因比所列举出的文明是否周全，但文明的多样性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肯定。汤因比的多样文明论是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199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并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提出要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的多样性提升到“人类共同的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认为这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这两个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决议，不仅反映了当前世界文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表达了世界各族人民要求发展各自文明和保持自己文明的热切期盼，可以说，它为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历史，证明历史的基础就是文明的多样性，离开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整体，就会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偏离文明多样性的历史观。因此，文明的多样性是理解中外历史之关键。

二

长期以来的国别史研究，无论是中国史研究还是欧洲史研究都是以国别为单元展开的，而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各个文明乃至国家的发展除其内部原因外，与外部文明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亦是其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原因。梁启超当年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所谓“中国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直至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

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当时，这是中华民族及亚洲各民族开始与西方民族交流并产生激烈竞争之时代。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其实，梁公这样的历时性划分未必合理，但他提出的在世界研究中国的观点是正确的。实际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中国的地缘有一定的封闭性，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从乾隆年间才开始的。梁公为了说明这一点，提出过两个当时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第一，“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第二，“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他试图通过这两个在常人看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中国历史从来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展开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因而，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说明，要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中加以考察。

梁启超这样立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两个原因：其一，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不满意，因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中，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是看不到的。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这里他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已经十分清楚。其二，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和贡献。他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虽然当时中国积弱积贫，但他认为：“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

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

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已逾百年，此后的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雷海宗先生曾指出世界史研究中应注意两点：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这两点说明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方，研究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世界意义。因为，这个时期是西方所谓的大发现时期，但对这个时期的西方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中国文化，这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全球意义。

吴于廑教授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相互关联的四篇论文，都是在世界范围对中国文化展开的研究，是一种全球史的观点，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

目前的世界史研究和中國史研究是分离的，这导致我们无法从全球史角度展开研究。后现代史学反对19世纪以来的宏大叙事，批评那种以西方为主，非西方为副的历史叙述，主张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interaction），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着眼，重绘人类历史画卷。认为历史就是世界各族互动的结果，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互动”，文化交流史就是文化的互动。这点，习总书记说得十分生动，他2015年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姿多彩的亚洲大家庭。”这是对亚洲文明史的精辟总结。

我们可以从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上千年的文化交流互动中，来揭示中华文化的自身发展乃至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其一，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有两次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用古代的“西洋”来说，即两次西洋文明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次是来自印度的佛教的传入，无论是《大唐西域记》，还是《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校注》都记录了中国与西部世界的关系。一次是晚明以来欧洲基督教的传入。我们可以将这两次的文化交流史放在一个历史框架中加以考察，从长时段的历史中探究中华文明变迁的外部原因和文化交流对中华文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其二，研究 1500—1800 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当代意义。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500—1800 年是第一个阶段，1840—1949 年是第二个阶段。1500—1800 年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历史中真正在精神上的相遇，是双方平等交流的一段历史，两大文明相互倾慕，相互学习，尽管有着文化的“争吵”，但没有“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少见的文化交流，是中国和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值得珍视。

三

文明因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形成和发展，每一种文明都有着自己的特质，多种多样的文明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但在人类历史上，如何对待不同文明有着惨痛的教训，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者对非洲文明、印度文明、印第安文明、印加文明进行了掠夺、摧残和灭绝。1415 年葡萄牙出兵占领了摩洛哥北部濒临直布罗陀海峡的休达，拉开了西方人的殖民史。葡萄牙人进入安哥拉后，开启了贩卖黑奴的历史。C. R. 博克塞

(Charles Ralph Boxer, 1904—2000) 在《葡萄牙人的海外帝国》(*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一书中统计，1450—1500 年的 50 年时间里，葡萄牙人在非洲捕获和收购的奴隶总数有 15 万人之多。西班牙人到达南北美洲后对阿兹特克王国和印加王国进行了灭绝式的占领，当印第安人抵制他们的政治、宗教和经济要求时，西班牙人就诉诸战争，杀光数千人，把更多人变成奴隶。而欧洲带来的疾病，更是给拉美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西方人用刀和火耕作这个世界，地理大发现既是人类对世界的伟大发现，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一次摧毁。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征服与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① 西方的资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虽然具有“双重使命”，在历史的悲剧式进展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②，但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却是一种历史性的灾难。这就是历史的二律背反。

如果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文明与进步的二律背反使一些文明消亡，那么 20 世纪初期的世界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使殖民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非西方国家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西方文明独占鳌头的局面逐渐被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所打破。这样，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关系再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包括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的关系，同拉美文明的关系，同伊朗文明的关系，同亚洲各国文明的关系，其中同中华文明的关系日益成为一个核心性问题。

1996 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 的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易廷镇等译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297 页。

② 同上，第 31 页。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出版刊行, 随即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 而是文化的, 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 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 在不同文明之间, 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他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 在不同文明之间, 跨越界限(Crossing Boundaries)非常重要, 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面对亚洲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 亨廷顿不得不承认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 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 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但他给出的答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和相融是困难的。一般来说, 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 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 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 Co-existence), 即冷战和冷和平的关系。那么, 西方文明主要面对的冲击是哪种文明呢? 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独特的, 而非普遍适用的; 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 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 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或提出挑战, 等等。

这些结论反映出亨廷顿内心的焦虑, 他对待非西方文明的想法是文明对立论, 尽管他也提出了一些文明协调的办法, 但结论是极其糟糕的, 那就是: 文明冲突与战争。

不可否认,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 亨廷

顿的许多预言得以在他以后的历史中被证实。但他所持的“文明冲突论”, 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 State Wars), 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 这些判断是值得商榷的。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 中华文明将如何与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和谐相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文明互鉴”的新文明观。

2014年3月27日, 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演讲, 他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论述, 深刻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和文明发展的规律, 及文明在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 人类文明的交流的确充斥着暴力、战争、征服等激烈的碰撞, 但同时, 人类历史上也存在着文明之间的和平交流。亨廷顿认为人类文明之间实现和平交流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当今世界“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互鉴与文明和谐的思想, 有力地反驳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者的意见, 明确指出“文明冲突”完全可以避免, 并提出解决文明差异的具体办法, 说明了文明差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习近平主席指出, 不同的文明发生于不同的土壤, 由于生长的自然、社会环境的不同, 它们“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这就指明了, 任何文明都是具有特殊性的文明, 从来没有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文明形态, 人类共同认知的文明特点和形态只存在于不同的特殊文明形态之中。无论哪一种文明, 它最根本的价值都不在于它是普遍的, 而在于它是特殊的, 在于它发展的历史和成果是独特的, 在于它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习主席的“文明互鉴观”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之道, 他说:“文明是多彩的, 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 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

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说明人类文明是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发展的。杀戮、战争是人类文明不成熟状态的表现。历史证明，中华文明正是在学习佛教文明后，自己的文学和哲学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因在明清之际学习和接受了来自欧洲的西洋文明，中华文明的天文历算才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欧洲人文主义传入中国，和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相互融合。

同样，在这段时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传入欧洲，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孔子的哲学成为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中华文化的制度性管理经验引起了欧洲的关注，并产生了影响。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指出：在法国和英国，人们认为，在儒学的推动之下，中国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所以，他们用这个武器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贵族。在欧洲，对于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孔子哲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运动，孔子哲学又间接影响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①

所以，习主席提出的“文明互鉴观”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总结，是对文明冲突论的直接回应，是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明相处的基本原则。这一崭新的文明观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当代运用，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完全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表达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型文明国家的东方智慧。文明互鉴观是一个崭新的文明观，它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这个时代的灯塔。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① 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